

# 他用一生来体验这座城市

陈村

人与人太熟悉，写起来就难了，应该从哪说起？我十几岁就认识黄石，再过几年都半个世纪了。我叫他石兄，他叫我小弟。黄石祖籍广东，生在上海，认识我时在公交公司上班。他上的是预备班，每天凌晨起床去公司报到，哪条线路缺人就派到哪儿，在终点站拉铃或上车卖票。要是都不缺人，他上午就高高兴兴回家了。有天，他大脑发昏，让一辆空空的公交车停在我家旁的马路上，在楼下大叫，要我上车跟他去玩玩。车到终点站后投入营运，黄石卖票，卖完跟我说两句路边的房子，就像他看画喜欢指点美妙之处。

那一阵我们有个小小的沙龙，我们五六个人差不多每天见面，聊天之余，有时骑车去一个叫华新社的地方在黄浦江里游泳，或者坐小火车去金山海滨，都是野景，江水和海水都黄黄的。运气好的时候，会借到外国文学，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草叶集选》和莎士比亚的剧本，会看到西洋画的印刷品，达·芬奇、米开朗基罗、伦勃朗还有列宾等，会听到巴赫、莫扎特、贝多芬、柴可夫斯基、圣桑等人的音乐。黄石聪明，看过的画能记住，听过的曲子能哼唱，还会弹一点点钢琴，看完电影念叨“兴高采烈的小松树啊，大雪染白了你的睫毛”。那时外头在革命，黄石无师自通地在家学画，从石膏像画起，有时骑着自行车背着画夹去苏州河边或虹桥路写生。父母是老报人，那时下放到了南京的9424工地，外婆去世后，黄石要看住家里的房子等待他们回归。我们去考大学时，他还在公交公司。以

后，他进了一间文艺报馆当记者，再以后，他去北美留学，天寒地冻，实在太寂寞弄得心力交瘁半途逃回。他到一个建造豪宅的房产公司当艺术总监。他懂各种装饰材料，有好的审美，这工作很相宜。

后来，孩子慢慢长大，我们渐渐老了。黄石有上海男人听太太话的美德，家庭美满，与世无争。在大家以为他就这样了的时候，黄石忽然用彩色铅笔画起了绘本。他画了一只猫和一个小女孩。白猫咪咪噜在外滩的故事很受好评。接着，他画《最美的上海》，当年在公交车窗外急速倒退的马路和几十幢房子被他一一定格。这书可以流传下去，成为上海余音绕梁的一个动人旋律。

除了当记者时写稿，黄石很少写文字，写必精彩。他信手乱写的《陈泓传》被我弄到一本小刊上发表，读过的人无不嘿嘿一笑。几十年前，他写过一个电影文学剧本《门与窗》，读过的人极少，似乎暗示他日后去造房子。他曾是弄堂网的活跃居民，自号“三姐夫”，在那里开窗般地画四格漫画，发噱的笨人故事，他写下上海愚园路285弄的往事和其他故事。弄堂网现已关门，留下的最著名的传说是老爷叔金宇澄在那里悄悄写《繁花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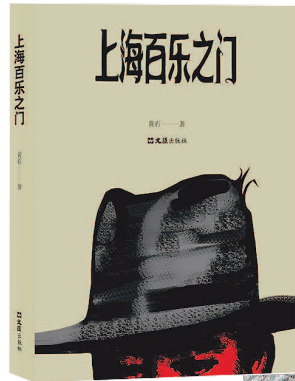
就这样，我们接近黄石的小说了。他的经历跟他的作品匹配成功。之前可视他的准备期，他用一生来体验这座城市，积攒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，写它，纪念它。

上海这座伟大的城市，应该有一万部作品来表述。它永远有未被发现的精彩，未被记

录的传奇。对黄石这个走不出上海的人来说，这城市就是他唯一的据点了，这里的人是他唯一熟悉的人群。由他写来，故事和人物很有质感，有根据，而不是披着一张风花雪月月份牌的毛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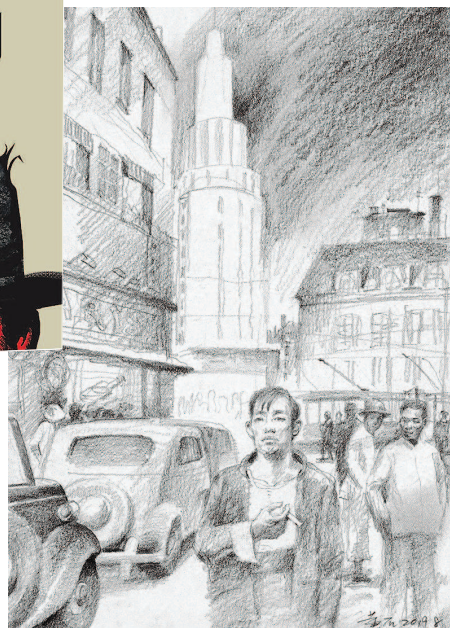
人们本来只知道王安忆一直在写上海。近年，上海的老头子们忽然像交作业似的也写起了长篇。金宇澄的《繁花》之外，有吴亮的《朝霞》等。再不写可能就迟了。60多年过去了，在这里成长，结婚，生育，衰老，送走前辈甚至是平辈、后辈，爷叔们有话要说。他们写大都市，而不是中国文学中更多的乡镇。他们写住了一辈子而不是道听途说的都市。我喜欢这样的说法：为一篇小说准备了一生。父辈凋零，朋友星散，当年的小伙伴忽然飞来又忽然飞走。我们聚餐，我们谈起20岁的故事，谈起父辈祖辈的故事，许多往事成了传说。传说如果不被记录将会飘散。按我的私见，不懂上海话很难写这城市，仅仅懂上海话也未必能写这城市。它成全过你，怜惜过你，伤害过你，冷落过你，唾弃过你，你为它抓狂，它根本不在乎你，你将一切看在眼里，这就成了，可以写了。

黄石就是这样的一个目击者，他从285弄出发，从邻居们，从张爱玲的弟弟，从马路对面弄堂的傅雷先生出发，空车开向外滩，然后一站站停靠。他将时间推到了1938年，那个纷乱、喧腾的年代，去记录更多的更杂的人。电车穿城而过，上车的是构成上海居民的学生、工人、店员、巡捕、保安、经理、舞女、流氓、外国人，加上收尸人，



《上海百乐之门》  
黄石著  
文汇出版社出版

►书中插图由作者手绘



在他笔下，他们活动起来，成为一出大戏。有的人逃了，有的人病了，有的人死了。有哭声，笑声和枪声。有欲望和泯灭。

等我知道了这部作品的时候，黄石差不多已经写完了，他发我电子文本，我在电脑上读完。这小说原名“收尸”，怕过于惊悚吓着看官，便改了个温和的标题“上海百乐之门”。学生在城里游走，巡捕在巡逻，电车装载客人，收尸车去拉死尸，而烟厂正给活人生产香烟，女工和舞女都有满腹的苦衷。沿南京路西行，静安寺右转，霓虹灯亮起来，有爵士钢琴声处，是这城市的另一拨人类。

黄石停下，将这些人组织起来，安排角色。读罢有点儿痛心，上海是一个我们不知拿它怎么办的城市，我们写再多的人还有更多的人，写再多的街道和弄堂还是不能将它解脱，

我们写再多的房子，之外有更多的房子。无法将上海写透，我们能做的是站在百年沧桑的地基上，背靠化石般的外滩，看看黄浦江和苏州河。开埠以来，许多人站在这里看过。无论天际线如何变动，河水如何变色，太阳和月亮照常升起。沿着黄浦江顺流而下，前面是吴淞口，是东海，是太平洋。走出长江口，世界就展开了。黄石没走出去，小说的主人公也没走出去，但黄石的后代告别了这座城市。上海成了他的来处。

黄石嘱我为他的小说写几个字，我就拉杂写了这些。将书打开，里面的人物就会自己走出来，告诉你，1938年发生在上海的生死离别，生活在上海的好人坏人。这个故事，像没有洗衣机的年代晾到弄堂里的汗衫长裤，在竹竿上滴水。逆光下，那么老的故事，还那么新鲜。

# 在被发现的过程中返老还童

肖复兴

“那个女孩的名字，肯定不叫合欢。韩信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是在六月一个早晨上学的路上。那条通向学校的街道两旁，正盛开着一树树的合欢花。”《合欢》这部小说开头这几句话，三年多前就写在我的一个空白笔记本上。这是我的第一本儿童小说《红脸儿》出版不久后的事情。

合欢树，和合欢树下的那位漂亮的老师，以及她可爱的小女孩，从童年起一直存活在我的心里，始终鲜活如昨。只是，我一直没敢去触动她们，触动她们，也就是触动我童年的记忆。我怕写不好，对不起她们，也对不起自己。在我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，还从来没有这

样犹豫踟躇过。

我知道，这就是儿童文学写作的难处。不知别人如何，我一直认为，在所有文学样式中，儿童文学最难。之所以难，是因为要写的对象是儿童，而写作者却已经不是儿童，早早远离了童年。这种时间和心理的落差，要求写作者重返童年，如同返老还童一样艰难，甚至是不可能的。

前些日子，重读陈伯吹先生1985年写过的一段话，这是陈先生为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《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》序中的一段话：“儿童的被发现”，这一提法，对儿童工作者说来，是一个重要的课题，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……如果把儿童看

作缩小的成人，无视他们独立的人格，那么，当然在文学天地里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了。”

陈先生说“儿童的被发现”，而不说“发现儿童”，我想，在于前者儿童是主体，后者写作者成为了主体。在儿童文学创作中，这样主次颠倒的，有不少，甚至是常见的。于是，作品中所呈现的儿童，便是陈先生所说的“缩小的成人”。这是我格外要警惕的。

于是，踌躇了三年多之后，只有八万多字的《合欢》，才迟迟写成。我变得如履薄冰，小心翼翼。

其实，故事并不难编写，难的是如何让“儿童的被发现”。在这样被发现的过程中，也发现了自己远逝的童年，竟然是

那样丰富多彩而令人心动。在这样彼此被发现的过程中，作者真的像是返老还童了。这实在是儿童文学创作者的福分。

我的小说，常愿意从结尾写起。《合欢》这部小说，最初，我写了三种结尾，让合欢的人生有了三种不同的结局。之所以这样写，是不想将小说带儿童小说既定的审美定势和创作模式之中，不想将小说写成一支甜蜜的棒棒糖。

我信服海明威曾经说过过的话：“一个作者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？是不幸的童年。”但，也不全是。听从了编辑和评论家以及朋友的意见，如今小说的尾声只剩下一种结局。尽管这一种结局依然有些惘然若失的伤感。



《合欢》  
肖复兴著  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尽管我写得小心翼翼，但不敢说写得很好。我要感谢出版社朋友三年多来一直的鼓励、宽容，和耐心的等待，让我写成了这部小说，让我的晚年能够奇迹般地重返童年。